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本期焦点：中国研究的理论与范式



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行动论的提倡

加加美光行

国家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的基本范式

何宏光 王培刚

中国研究的国际化：国际中国研究的架构及其价值与视角

史明

中国城市居民的单位效益和收入不平等

谢宇 吴晓刚

自我行动的逻辑

——一个理解中国入市场实践的理论框架

汪和建



2007年春秋季节合卷总第51-6期

中國研究

CHINA STUDIES No.5 - 6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研究 (2007 年春秋季合卷总第 5~6 期) / 周晓虹, 谢曙光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097-0395-3

I. 中... II. ①周... ②谢... III. 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现代-丛刊 IV. D66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8432 号

中国研究 (2007 年春秋季合卷总第 5~6 期)

主 编 / 周晓虹 谢曙光

出 版 人 / 谢曙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闻 翔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贺拥军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9.25

字 数 / 344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0395-3/D·0157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发 刊 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做是1949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1978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19、20和21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等,都既

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年5月

中国研究

2007 年春秋季合卷

总第 5~6 期, 2007 年 11 月出版

目 录

发刊词 / 1

主题研讨: 中国研究的理论与范式

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

——共同行动论的提倡 加加美光行 / 1

国家与社会: 当代中国研究的基本范式 何宏光 王培刚 / 29

中国研究的价值归依: 普遍主义抑或特殊主义 王小章 / 57

中国研究的国际化: 国际中国研究的架构及其价值与视角
..... 史 明 / 66

文化间的踌躇: 中西学者间的汉学与中国学 任剑涛 / 82

学术论文

中国城市居民的单位效益和收入不平等 谢 宇 吴晓刚 / 98

中国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阶层

——经济改革前后代内流动模式之比较 李春玲 / 122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中的差序格局 张文宏 / 155

治理型设计: 武汉两个社区的空间与权力 薄大伟 / 166

自我行动的逻辑

——一个理解中国人市场实践的理论框架 汪和建 / 183

闽西武平中山镇军家人与客家人的民间信仰 石奕龙 / 210

连接过去与当前的桥梁

——台湾的社会学与人类学 葛瑞黛 / 237

作为新政策领域的跨国华人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新加坡 刘 宏 / 252

书评与随笔

集体果真或如何不朽?

——对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的
一种解读 蒋 超 / 276

横跨大陆的回响

——专访全英中国学研究所所长费立民教授 陆 远 / 285

英文目录与摘要 / 295

稿约 / 302

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

——共同行动论的提倡

加加美光行*

摘要 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中存在的东方主义倾向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不断受到批判,但至今仍然以顽固的结构形态而存在。其原因在于,这种批判虽然指向了东方主义的认识结构,却忽视了其作为存在结构的面向。实际上,由于对“自由主义=现代主义通过‘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张’来实现其全球范围的胜利”表示怀疑的人急剧减少,东方主义的认识结构和存在结构不仅在欧美世界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强势复活。鉴于从“地域研究”内部彻底扭转这股潮流非常困难,有必要通过确立作为“国别学”(nation-studies)的“中国学”来取代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而实现这种范式转换的方法论前提是本文所提倡的“共同行动论”(co-behaviorism),亦即确立研究者之间的共同主体性,并将各种主体间的相互联动作为中心视角来展开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

关键词 地域研究 中国学 东方主义 新范式 共同行动论

序言：本文的课题

2007 年 3 月,应日本学术会议主办的“‘地域研究’前沿——知的创

* 加加美光行,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ICCS) 主任 (Kagami@vega.aichi-u.ac.jp); 本文原为日文,译为张玉林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zqy10259@163.com)。

立”研讨会邀请,我有机会参与了有关“地域研究”问题的讨论。与会的大部分报告者认为,在“地域研究”中,几乎不可能确立类似于其他学术领域中的专门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理论,尽管“地域研究”是跨学科的,但也不过是诸多学科在此相遇的“场域”(Arena)而已(日本学术会议 SIJ 论坛,2007)。我曾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地域研究”确立与其他学术领域不同的固有的方法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①但是,目前的“地域研究”确实没有固有的学术性的方法论。正因如此,“地域研究”的英文名称 Area Studies 或 Regional Studies 只是被称作 Studies,而非地域学 (Regionology)。当然,被视为“地域研究”一个类别的中国研究也不例外。

从这一意义来说,假如中国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就应该考虑将名称改为“中国学”。就“地域研究”整体而言,同样也应该创造出“印度学”、“印度尼西亚学”、“泰国学”、“伊朗学”、“伊拉克学”、“肯尼亚学”等等。那样的话,“地域研究”名称自身就可以消失了。

我之所以主张“地域研究”应确立其固有的方法论,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也就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地域研究”中存在着由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也即“未开化的东方”、“文明的西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导致的偏颇,而且这种弊端随着时间的演进愈加严重。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重点阐述。

一 “地域研究”的产生和国策研究:政治含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与亚非地区(简称 AA)^②的关系开启了新的序幕。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前期的大约 20 年间,随着亚非地区的旧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美国对亚非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影响(presence)远远超过了“二战”前的旧宗主国。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东方世界与自由主义的西方世界相互对立的冷战时代也一起到来。

在此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 K. Fairbank)、麦肯(Don McKey)等人于 1946 年组织成立了“国际与地域研究专门委员会”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早论述“地域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是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林武和山口博一(见林武,1969;山口博一,1991)。

② 抛开地缘政治的含义,本文将亚洲、非洲、中东和中南美洲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统一简称为 AA。

(Facult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并创立了他们称之为“地域研究”的研究领域(John King Fairbank, 1982)。由于费正清是中国研究专家, 中国研究也就成了“地域研究”的核心内容。

美国“地域研究”被认为是基于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而产生的。比如与前述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等人创建“地域研究”相关, 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 J. 康奈特 (James B. Conant) 在 1949 年曾这样说道: “在战争期间我们为军队发挥的各种作用中, 包括对于从占领地区的司政官那里送来的学生的培养工作。……它涉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地理以及经济的研究。由于充分认识到这些研究方法具有很高价值, 目前在研究生院中实施了多少与此相似的相关地域研究计划, 另外一些计划也正在规划之中。”(James B. Conant, 1946; 嘉治真三, 1952)

在这种适应战争需要背景的基础上, “二战”后的“地域研究”进一步受到“二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 特别是受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以及美国在确立冷战格局时对共产主义封锁 (containment) 政策的强烈影响。进而, 以 1950 年 1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演说《中国的危机: 美国政策检讨》(“Crisis in China-An Examination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Dean Acheson, 1969) 为转折, 出现了有关“是谁失去了中国”(Who lost China?) 的责任追究论争, 国共内战期间 (1946 ~ 1949) 的美国对华政策受到批判。由美国参议员 J. R. 麦卡锡掀起的号称“麦卡锡主义旋风”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期间, 费正清、奥温·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以及因《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而闻名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等人, 都因为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而受到攻击。最后, 1950 年 6 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更是决定性地促成了这一潮流的形成。

1953 年, 与朝鲜战争的停战几乎同时, 美国的国防政策也发生了转变。艾森豪威尔上台执政之后, 杜鲁门政权时期由 G. 凯南等人倡导的较为稳健的“封锁政策”(Containment) 被看做失败主义而遭贬斥, 新的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多米诺理论”(Domino Theory), 美国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反共色彩。与此相关, 在整个亚非地区, 美国开始取代英国、法国、荷兰等旧殖民地宗主国而正式展开了其军事扩张 (Commitment)。

另一方面, 在“二战”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 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也接连脱离殖民统治而实现了政治独立。1955 年 4 月, 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到 50 年代后期, 从原法属印度支那开始, 美国强化了对整个亚非地区的军事扩张, 与此相应的是实施经济援

助,从而采取了强化亚非国家的依附性的“新殖民主义”政策。^①

在冷战体制下,新殖民主义将亚非地区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囊括进其势力范围,从而将亚非拉(AALA)变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扩张各自势力的狩猎场,并在多个地区引发了作为美苏之间的代理战争的“地域冲突”(Regional Conflicts)。而所谓“地域冲突”中“地域”的称呼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它包含着这样一种世界观,亦即不仅不承认在殖民地化之前已经存在的亚非拉民众所在的国家(Country, Land)是与欧美诸国同样的政治主体,而且在实质上(无论表面上如何)不承认这些国家在“二战”后实现独立、确立主权之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构成单位。^②

当然,在费正清开始“地域研究”之初,“地域”的概念不仅包括亚非地区,也包括欧美地区。但在作为冷战时期的政治概念使用时,就几乎限定于亚非拉国家,而欧美诸国事实上被从其中排除了。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英国萨斯克斯大学以“地域研究”为主的各研究科,最初包含了欧洲、美国和古代中世纪等研究领域,后来就逐渐将研究的对象区域限定于东南亚、非洲和苏联(雷格,1989)。

在上述背景下,几乎与哈佛大学设立“国际与地域研究专门委员会”同时,华盛顿大学也在1946年建立了“远东问题研究所”(Far Eastern Institute, 1949年改组为“远东俄罗斯问题研究所”,即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到1948年,受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哥伦比亚大学又创建了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的“东亚研究所”(the East Asian Institute)。这样,以“中国研究”为中心的“地域研究”在美国各地纷纷出现。而到万隆会议召开、美国正式介入印度支那半岛的1955年,作为对以费正清为中心的“国际与地域研究专门委员会”的继承,哈佛大学又组织实施了“中国经济政治研究计划”(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后为纪念费正清,改称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适应时代的要求,以“中国研究”为中心的东亚“地域研究”开启了新的一幕(石川忠雄,1957a, b; 1958)。

如前所述,以中国研究为中心的“地域研究”,其核心部分在最初即

① “新殖民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61年1月召开的第二届非洲人民会议上(土生长穗,1962; Blanchard, 1996)。

② 西方列强侵占原住民家园的历史不仅表现在AALA诸国,也表现在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家园的侵占(苏珊·小山,1995)。

适应了美国政府安全保障政策的现实需求而被纳入其框架之中。随着肯尼迪政权取代艾森豪威尔政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冷战体制进一步强化,“地域研究”在依然保留其基础构成要素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国策研究”的特征(国分良成,1990)。也就是说,作为自由主义盟主的美国高扬起防卫和势力扩张的旗帜,与以苏联为盟主的社会主义阵营时而敌对,时而谋求共存,世界进入了由美苏两国分割统治的时代。基于这种分割世界的需要,以AALA为对象的“地域研究”就成了“国策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而其中自然容易看出视东方(AALA)为蒙昧、西方为文明的“东方主义”世界观在施加着影响。

基于以上背景,我将第一阶段的“地域研究”概念界定为适应“二战”后时代的需要,特别是美苏两国支配国际政治经济的需要而主要表现为“国策研究”指向的研究领域。

二 日本“地域研究”的出现及其政治含义

1. 中国研究所的设立与“二战”后“中国研究”的启动

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1946年1月建立了“中国研究所”,进而又以此为母体于1951年5月成立了“现代中国学会”。建立这两个研究机构的核心成员主要是那些在“二战”前和战争时期持“日中提携论”观点,置身于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等国策研究机关,以马克思主义左翼或“容共”立场从事“支那学-支那研究”,而在“二战”后带着某种赎罪意识重开中国研究的学者。但从性质上来看,这两个机构的“中国研究”当时并未纳入“地域研究”的范畴。因为如费正清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研究所见的那样,美国的“地域研究”当初也带有容共的性格。问题在于,中国研究所和现代中国学会的研究与日本政府之间并无人员和资金上的联系,这一点同“二战”前的“支那学-支那研究”不同。因此,它不像美国的“地域研究”那样具有国策研究的性格。

尽管如此,在中国研究所创立初期,确曾试图获得日本政府特别是外务省的支援,亦即作为“二战”前具有国策研究性质的中国研究的延续,设立一个左翼、容共的研究机构。具体来说,就是在“二战”战败前夕以近卫文麿为总裁而设立的、“二战”后迅即被占领军司令部(GHQ)关闭的国策机构“日华协会”的资产基础上,建立中国研究所(伊藤武雄,1964;伊藤武雄等,1976)。

必须指出,在建立中国研究所的主要成员中,有很多人与近卫文麿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其背景在于,近卫既是与天皇家族有直接关系的五个摄政家族之一的近卫家族的掌门人,享有公爵爵位,同时在京都大学读书时又受到日本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当时任京大教授)思想的影响,步入政界之后显示出较浓厚的容共色彩。例如,近卫曾经很看重后来因佐尔格事件被判刑的尾崎秀实(满铁调查部嘱托)等人,并当作亲信而予以重用(宫西义雄,1983)。与此相关,伊藤武雄和平野义太郎等人也曾在近卫的庇护下从事国策研究。

实际上,继承“日华协会”资产的计划因受到外务省(当时为“大东亚省”)的拒绝而未能实现,但得到了10万日元的援助资金,中国研究所由此启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初期的日本外务省处于美国占领军的控制之下,不可能无视占领军司令部的意向而自主做出决定。

在中国研究所建立时的理事当中,平野义太郎、岩村三千夫、尾崎庄太郎、浅川次郎、中西功五人曾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隶属于左翼研究机构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他们是日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左翼研究者。而其他理事有曾属于“日华协会”的伊藤武雄、具岛兼三郎,属于回教圈研究所的野原四郎、幼方直吾,这四人的政治立场也都是容共的,但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相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伊藤武雄,1981)。

基于上述背景,中国研究所在设立之初并没有明确树立马克思主义左翼的主张,而是保持了一种中间立场。比如1946年8月国共内战爆发时,第一任所长平野义太郎在旧制“一高”(第一高等学校,原东京大学预科)的演讲中,仍然说“国共两党不可能开战”,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都表示支持(小岛晋治等,1983)。而当因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而闻名的鹿地亘(1939年9月在桂林组织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于1946年5月回国进入中国研究所之后,国民党的实情和国共内战的实况逐渐被获悉,中国研究所的立场也逐渐向左转,开始批判国民党,支持中共(《中国研究月报》编辑部,1993)。

在中国研究所出现上述转变的1947~1948年,适逢国际社会东西冷战体制迅速形成的时期。因此可以说,中国研究所的左转也较多地受到其影响。而当1949年5月柏林被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研究所的左倾立场已完全确立。但也就在此时,美军(GHQ)的日本占领政策发生了大逆转,原来的容共、民主化、非军事化指向的立场转变为反共的军事战略。与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相呼应,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清共”运动。

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在美国的主导下开始着手处理“二战”后问题,试图通过“对日讲和”的实现早日摆脱占领,恢复独立主权,而《旧金山讲和条约》的签订(1951年9月,1952年4月生效)使这一目标初步完成。但是,讲和以后,日本的主权独立依然只是名义上的,与和约同时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在实质上将日本纳入了依附于美国的框架之内,当然也使其内外政策增强了反共色彩。

在这样的背景下,采取容共立场、具有左翼倾向的中国研究所就完全失去了涉及日本国策研究的可能性,也难以意识到始自美国的“地域研究”的潮流并产生作为“‘地域研究’者”的自觉意识。

2. 亚洲政经学会的设立和日本“地域研究”的开始

1953年6月设立的“亚洲政经学会”使日本的“地域研究”逐渐浮出水面。这时《旧金山讲和条约》已生效一年,日本政府将摆脱美军的占领和恢复主权、发挥内外政策的自主性当作首要任务。当然,正如前文所述,在当时的东西冷战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决定了日本对美依附的状况下,这种恢复主权的要求终究难以实现,但作为一种强烈的主观愿望确实存在于国家领导层的意识之中。

1952年以后,在形式上恢复了主权的日本依然被迫依附和追随美国的现实状况,必然堵塞日本政府像过去的近卫文麿内阁一样采取容共政策的道路,而使其趋向反共。亚洲政经学会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它的作为一个学会的趋向,是同日本领导人在主观上恢复政策自主性,而在现实中依附美国、走上反共道路的趋向重叠的。也正因如此,亚洲政经学会就带有实施国策研究的主观意图,从而成为日本“地域研究”的先导。

在学会设立时起到核心作用的理事当中,研究人员有植田捷雄、英修道、入江启四郎、板垣与一、原觉天、川野重任等人,政府方面有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川融、课长小川平四郎,进而,经济界也有担任国策Harp副社长的水野成夫等人。从资金方面来看,学会得到了内阁官房长官调查室和外务省亚洲局的不同程度的资助,具有明显的国策研究指向的要素。

在后来亚洲政经学会成立3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上,创建者之一的英修道在追述其成立的背景时,曾发表过对“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感怀。据他回忆,在近卫文麿内阁上台的1937年左右,兴起了“重视亚洲”的风潮,而其中的领头人物有两个,一是属于国立大学系列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植田捷雄,而另一个就是英修道本人,属于私立大学系列的庆应大学。实际上,近卫内阁打出“重视亚洲”的旗号是在1938年之后,

当年设立了中央机构“兴亚院”，近卫发表了名为“论东亚新秩序”的演讲。也就是说，上述二人在近卫的庇护下处于领导日本的亚洲研究的地位。在二人于战争期间已有合作的基础上，1951年旧金山和约缔结之后，植田向英修道提议将亚洲研究加以组织化（英修道等，1993：36-37）。基于这一背景，植田成为亚洲政经学会的首任代表理事。顺便强调，他在1930~1937年间曾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教授，后来则作为外务省的“嘱托”加入关于中国、满洲的国策研究，同时也成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嘱托”，从事当时的中国研究（支那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

亚洲政经学会的另一位创建者板垣与一也具有代表性。他1940年起任东京商科大学副教授，负责讲授“殖民政策”课程，1942年12月作为该校东亚经济研究所代表团（团长为赤松要）的一员而赴新加坡，后来留在当地成为马来亚军政总监部的调查员，进而组织支援马来民族解放运动（板垣与一，2004）。

由此可见，亚洲政经学会设立时的主要理事大都在“二战”前和战争期间从事过日本的国策研究，这一事实显示了该机构作为一个学会组织的特征。

回过头来看，正如前文所述，亚洲政经学会成立时的许多理事都有在近卫的庇护下从事国策研究的经历。它与中国研究所的区别在于，其研究的特点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左翼或者说容共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亚洲政经学会的理事们当中难以看出。与此相关，在其建立时的理事当中，代表了年轻一代的理事石川忠雄曾经在自传性的《回想录》中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当日本学者中的多数人将此看做是历史的必然开始赞美中国共产党的时候，由于他本人对共产主义冷眼相看，因此能够保持对中共政权采取客观的和批判性的研究立场。进而，与他自己采取同样立场的年轻人还有东京工业大学的卫藤沈吉、东京大学的坂野正高和一桥大学的松村祐次等人。而在昭和30年（1955年）以后，当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批判风潮逐渐高涨之时，这批人的发言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石川忠雄，1997：78-80）。其中卫藤在学会成立时也同石川一样担任理事。

石川所说的共产主义批判的风潮大概是指下述状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受中国革命影响的日本共产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取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战略。结果日共党内的“所感派”和“国际派”之间的派性对立被激化，私刑和审查一度盛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5年7月，日共第六次全国协议会试图放弃武装革命路线而转

向和平斗争,但由此给党内带来了巨大冲击,许多人纷纷退党。在混乱中,针对共产主义特别是日共的怀疑和批判舆论由此兴起。随后,在斯大林去世3年之后的1956年2月,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批判,并披露了斯大林的独裁所导致的大清洗状况。这进一步强化了对于共产主义政治集团或政治权力的强烈怀疑和批判。

实际上,在前述冷战体制强化,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特别是针对亚非拉诸国的反共、反华性质的干涉政策(多米诺理论)背景下,置身于日美安保框架内的日本所采取的更加明显的反共立场,也推动了针对共产主义的怀疑和批判的舆论。

当然,对共产主义采取批判的和客观的立场,与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原本是不同的。卫藤沈吉在纪念亚洲政经学会成立30周年的座谈会上曾这样说道:

据我所闻,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学研究会、中国研究所、现代中国学会等战败之后成立的学术组织,都被日共或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领导权,以明确的政治倾向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倾向于实证研究的亚洲研究者,抱着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创建一个学术性学会的目的建立了亚洲政经学会。

针对卫藤的发言,板垣回应道:“尽管如此,(亚洲政经学会)也没有排除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它还是一个自由的场所。”而英修道则说:“并没有故意要排除。应该说是由于我们掌握了领导权,马克思主义者进来也没啥关系。”(英修道等,1993:37-38)也就是说,在板垣和英修道二人看来,亚洲政经学会虽然聚集了许多对共产主义“冷眼”批判的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但其立场并不是反共的,毋宁说是容共的。

但是,当考虑到日本内外的政治状况时,亚洲政经学会的立场就不能不抛弃容共的色彩而实质上转向反共产主义。这当然也使亚洲政经学会的研究更接近于美国的国策性的“地域研究”。事实上,亚洲政经学会成立不久就高度关注美国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的动向。例如,首任代表理事植田捷雄在1953年9月到1954年8月的一年间,先后访问了美、英、法、德、意、荷兰、瑞士和印度八国,回国后在《历史教育》杂志上发表了《美国的中国研究》,进而在《美国人》杂志刊登了《美国的亚洲研究》。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在“二战”后，美国为了适应与苏联的严重对立而进行了苏联研究，同时将中共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出现看做美国自身的失败，作为苏联研究的一部分而探索对华政策也非常必要，于是出现了中国研究。研究结果，包括费正清和本杰明·史华兹等亲华派学者在内的大部分中国问题研究者的看法是，中国的共产化不可避免，而且不可能采取“铁托化”的与东西方保持同等距离的不结盟政策。（植田捷雄，1954，1956）

在植田回国不久的1955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立，美国的中国研究正式启动。大约在1年之后的1957年7月，亚洲政经学会的年轻理事石川忠雄前往哈佛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回国，同样对美国主要大学的“地域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的实况进行了详细介绍。由此看来，成立不久的亚洲政经学会对美国的地域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高度关注，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日本自己的地域研究。

亚洲政经学会成立不久，受朝鲜战争“特需”的影响，日本经济异常景气，终于迎来了“二战”后的复兴。与此同时，以逐渐壮大的经济实力为背景，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开始更加强调专门从事亚洲问题研究的必要性。这也同样推动了亚洲政经学会的活动（东畑精一，1984：175 - 176）。不过，在日本学术界最初使用“地域研究”的并不是亚洲政经学会，而是20世纪50年代末设立的亚洲经济研究所。

3. 亚洲经济研究所的设立与“地域研究”

1957年7月，在岸信介首相的秘书藤崎信幸（在满洲时代曾因岸信介的关系进入当时的亚洲问题调查会）的介绍下，亚洲政经学会的核心理事板垣与一、原觉天和川野重任等人与岸信介在箱根举行了会晤，建议设立亚洲经济研究所（板垣与一，1985；小林英夫，2005）。板垣等人的建议是要设立一个国策性的研究机构，他本人在战争期间的马来亚军政时代并非单纯的学者，而是同时具有“实践”国策意图的亚洲问题研究者。这一点在其1962年出版的《亚洲的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中得到如实反映。^①

板垣在会谈时对岸信介说，“二战”后亚洲的经济发展受到了追求独立和自立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支撑，因此日本对亚洲的经济技术援助必须有助于这种自立发展的精神，并且以此为基础。而要推进这项事业，就必须

① 我于1963年阅读了该书，这对我进入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